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

陈思和◎主编

通往自由之路 ——罗素在中国

曹元勇◎编
朱学勤◎序



Bertrand Russell

伯特兰·罗素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西方哲学史》《西方的智慧》等。在哲学思想上，他秉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运用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来思考哲学问题，推进了现代西方的分析哲学的发展。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在文学方面，罗素的《自传》是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学自传作品。195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20年8月，罗素曾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曾作过他的中文翻译。回国后，他完成了《中国问题》一书。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

陈思和◎主编

通往自由之路 ——罗素在中国

曹元勇◎编 朱学勤◎序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 / 曹元勇编.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5
(世纪的回响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 - 7 - 81132 - 590 - 4

I. 通… II. 曹… III. ①罗素, B. (1872 ~ 1970) —思想评论②罗素, B. (1872 ~ 1970) —影响—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B561.54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2918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网 址	www. juacp. com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腾莺图文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2 - 590 - 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出版序

陈思和

《世纪的回响》丛书共编过三辑，每辑十种。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编成。列名主编的是李子云、赵长天和我，但主要是李子云老师策划的。当时出版界已经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纯文学的著述难以正常出版。李老师负责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工作，她想学习巴金先生在30年代主编《文学丛刊》的榜样，编辑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系统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这个想法大约是得到了巴金和王元化（他们都挂名为这个基金会的法人代表和会长、副会长等职）等前辈的支持，我记得“世纪的回响”五个字是巴金先生颤抖的题词，而王元化先生还亲自提议并且找人编辑了诗人辛劳的创作集。具体的过程我记不清了，最初李老师与我讨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正准备出国，她要我推荐两个年轻人来帮她做些具体的编辑事务。我就建议她找复旦的郜元宝和华师大的杨扬，那时他们俩还都是副教授，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杨扬的积极性似乎更高一些，他为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出了不少的力。前两辑编得很顺利，由珠海出版社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出版。第一辑为“创作卷”，第二辑为“批评卷”，每辑十种，作者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里不怎么提到的作家和批评家。“创作卷”有许地山、废名、凌叔华、卞之琳、吴组缃、冯至、穆旦、芦焚、丽尼和辛劳；“批评卷”有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叶公超、李健吾、梁宗岱、朱光潜、李长之和路翎。编者大多是复旦、华师大的青年学者与一些还在读书或者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也有个别年纪较大的研究者参与了工作。这两辑的作者名单是怎么定的我不了解，如果我参加了意见的话，也许“批评卷”里会有唐湜、常风两位的文集。我回想一下自己当时的行踪，1995年底到1996年上半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其后有两次去瑞典和台湾，到1998年下半年我又去了韩国首尔大学半年，总之，是不怎么在上海。等我回来可以安心做一些事的时候，那两辑书已经顺利出版了。

丛书的前两辑有过不少好评，第一辑出版后不久又重印了一次，正面的评价也不少。出版社方面很高兴，有一次总编还特地来上海请了两桌酒席。本来出版社还想把它作为重点图书去参加评奖，但后来发生了一点问题，因为那些作品都是从原著中找来的，作品的语言还保留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言习惯，现在看来就有些不规范，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曾经想按照现在流行的规范修改，但李子云老师坚决不同意，要求原汁原味地保留当时作家的语言习惯。这样一来，历史原貌是保留下来了，但却因此无法参加全国性评奖，据说按照现在的出版规定来衡量，这套丛

书的“语言错误”超过了万分之三的标准。但是因祸得福,这套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保持了历史原样,这一点,对研究者对读者都是弥足珍贵的。不过这套书在出版过程中也出过一些纰漏,最有意思的是,设计封面的是一位当时颇有名气的年轻人,他在电脑里找作者照片时,竟忘记了吴组缃的名字,只记住了一个发音“缃”,在电脑里找来找去找出一张吕叔湘的照片就放上去了。等到书印出来了才被人发现,于是出版社只好返工,重印封面,大约是赔了一些钱的。这本有吕叔湘头像的错本,我还保存着。

接下来可以说到丛书的第三辑了。前两辑出版的成功,使李老师和出版社都有了信心,于是开始商量编辑第三辑。因为前两辑分别是“创作卷”和“批评卷”,有人建议第三辑可以编一套翻译卷,出版翻译家的作品。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当时我建议李子云老师,是否可以改变一个思路,不编翻译家文集,而从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选出十位,编一套他们对中国的影晌的文集,这样可能更加有意思一些。这个建议马上就得到了李子云、赵长天两位的赞同。李老师请示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也很支持,还介绍了黑格尔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认为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如果能编成一卷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周围没有人对黑格尔在中国的历史有研究,几经商量后,决定了这样一批选题:《尼采在中国》《易卜生在中国》《弗洛伊德在中国》《托尔斯泰在中国》《泰戈尔在中国》《达尔文在中国》《杜威在中国》《罗素在中国》《克鲁泡特金在中国》《白璧德在中国》。总选题为《世纪的回响》第三辑“外来思潮卷”。这套书的规模相当壮观,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系统的专题性资料汇编。每一卷都不仅包括外国思想家或者作家在中国被翻译介绍的原始材料,还收集被研究、被阐释、其思想观点在中国被应用的材料。我们所约的每卷编者都是对某个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因此,第三辑的编辑工作还是很顺利,大约一年以后大部分都已经如期交稿了。

这一辑的审阅工作我稍微多负一点责任。一来是丛书的前两辑我基本没有参与,都是李子云、赵长天两位在工作,我虽列名为主编,心里很歉疚;二来这个选题也是我的一个未了的心愿。二十多年前,我刚毕业留校,中文系安排我担任贾植芳先生的助手,协助他主持的一个国家“六五”社科规划项目中的子项目:《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资料汇编》。这项工作进行了近三年的时间,在贾植芳先生的指导下,我和其他同事一起收集整理了近二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还编写了六万多字的大事记。这项研究工作打开了我的学术视野,过去我们研究现代文学,一般都局限在国内的视野,尤其是批判了胡风的新文学移植论以后,除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外,很少有人把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放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里加以考察。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方法兴起,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热点,贾先生开风气之先,着手研究和编辑这一领域的大型资料,是非常有眼光的工作。可惜资料汇编完成后,出版

方面受到了阻碍。我们的构思过于宏大,内容也过于丰富,反倒成为出版的一个经济负担。这过程中换了几家出版社,每家都说是好书,有价值,诚诚恳恳地接受以后,就放在那里没有声息了。几经催问都不得要领,最后等着我们主动取回了事。这套资料汇编一直放到2004年,为了给贾先生庆祝九十大寿的生日,经过大量的删除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印了出来,书名改为《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1898—1937)》,分上下册,百万字。原稿被删除了一半以上,被删除的部分,除了大事记以外,主要是涉及具体外国思想家或作家对中国的影响的部分。这部书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证明了这个选题在今天依然是学术界的一个空白,有着大量的市场需要。

我现在要说的是,《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正是在贾先生主编的那本资料汇编还没有出版音信的时候,着手策划编辑的。我协助贾先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有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知识和视野。中国的现代文学其实是在呼应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始起飞的,晚清开始,中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枪炮侵略和心理屈辱的同时,开始思考现代化的问题,逐步确立了世界性的视野和观念。而这一新的信念的确立,正是以推崇西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标志的。我们从鲁迅推崇赫胥黎《天演论》到信仰进化论,从苏曼殊钟情于拜伦、雪莱的浪漫主义,从梁启超大力介绍西方英雄传记等言论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学生在西方留学,受到西方著名人士的影响而终身不改其志的例子很多,胡适一生追随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徐志摩追随罗素、崇拜泰戈尔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巴金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信仰,梅光迪、吴宓、梁实秋们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宣传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都可以成为中西思想关系史上的佳话。还有,在五四时期西方著名学者来华的讲学,如杜威、罗素等人在中国的讲演,都像龙卷风似的激起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巨浪。我们今天只有正视这一切,才能够比较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能够比较贴切地理解现代文学的真实面目。

可是,仍然是好事多磨,就在第三辑丛书编完交付之际,出版社方面又出了状况。先是那位很有事业心的总编突然病倒,后来好像是出版社经营上发生了问题,拖了几年,书都已经排好了清样,做好了光盘,几经校对,该做的一切都做了,就是没有顺利出版。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当年支持这项工作的前辈巴金先生、元化先生都先后作古,李子云老师也卸下了文学基金会的工作重担。这期间我与其他人做过努力,促使这套书尽快问世,但好像有其中的一本印出来了,其他九本依然杳无音信。在这种情况下,这套丛书的编者之一,同济大学的孙宜学教授慨然出面周旋,联系了江西高校出版社,并且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他们不愿看到这套有价值的丛书长期搁置于生命的临界点上不能焕发生命活力,也希望在新世纪的文化发展与学术发展中,继续能够听到上一世纪文学传统的薪火传承和大潮回响。经过几方面的协商,我们现在顺利将《世纪的回响》第三辑“外来思潮卷”交给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体例格式等一律沿袭原来的模式。在这里,我不

仅要向慷慨支持我们的江西高校出版社,也要向所有为这套丛书出版作过努力的朋友们,表示我的衷心的感谢。

这套丛书与《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可以配套。《汇编》从整体出发,着眼于介绍大的思潮流派;这套丛书从具体人物着手,一人一本,深入而系统。两者搭配,正好是一个理想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库。前几年,我曾经在北大—复旦比较文学高级论坛上介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时候,有人问到这个研究领域有没有参考资料和教材,我的回答是,教材目前有过几种,但真正的有参考价值并可供阅读研究的原始资料,却很少。现在《汇编》与这套《世纪的回响》相继出版,可以说填补了一大块学术的空白点。新材料必然会推动新的学术研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给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成果。

《世纪的回响》原来就有钱谷融先生写的序在上,但因为换了新的出版社,有些事情需要向编者、读者和朋友们有所交代,于是再作如上的补充,是为序。

2009年2月9日写于香港岭南校园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90个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90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90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90年中,我们却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趋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璨,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吗?

新中国成立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1935年12月到1949年4月止,历时14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七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惟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而话又说得很谦虚。

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能够重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地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对将近 90 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分辑加以出版。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受到重视的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曾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一些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代序：让人为难的罗素

朱学勤

中国青年学界在反思“五四”思潮。这样的反思有积极意义，只恨相见太晚。反思中，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在流行：“五四”中西思想交汇，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分别师承英、法：从法国过来的激进宣传受激进主义者青睐，从英国过来的保守学理则受保守主义者欢迎。依此推理，自然就鄙薄法国，崇尚英国，似乎英国知识分子都是保守型君子，法国人多为轻浮的激进分子。五年前，我自己也是这样一种观点，并试图以这样一种认识重新梳理法国左翼传统对中国近代观念史的影响。我将这一源流称为“法国病”：好言革命，动辄起义，中国近代意识形态的血液里即有这一成分，至今尚未淘洗。

如此二分法，一开始亦无大错。但是一旦流行，而流行往往反而意味着凝固，凝固为一种流动着的僵硬模式，事情则会走向反面：就史实层面而言，可能削足适履，简化甚至歪曲“五四”中西思潮交汇时那些错综纠葛的历史事实；就现实层面而言，或许会以反思“五四”激进思潮为学理托辞，抢先责难并抛弃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真正应该淘洗的那些思想观念却遮盖起来，不去批判。这样，一场健康的反思还未走完正途，即有可能从反思走向绥靖，中途变质，变质为一种曲学阿世的时尚。事实上，一种过分的倾向已经发生，某些观点嫌否定“五四”还不够，要一直否定到辛亥，甚至否定到戊戌，即为显例。我私心以为，保守主义的精髓，是求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与人格发育的平衡，而不是偏向另一个极端。在扬弃法国式革命狂热的同时，是否应该把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从那张皮上小心剥离下来，“保”而“守”之，这才是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态度？然而新出的危险却是，不倒脏水倒孩子，脏水还在荡漾，孩子却可能已经扔了。

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这个人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其寿命长，情人多，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他都未偏废，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读罗素的学术著作，冰清玉洁，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澎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他不畏权势的激越抗议。几乎难以设想，像他这样的纯粹学者竟也会因为不同政见，两次入狱，最后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当时已达九十高龄。百年人生，他始终将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相融于一身，肯定很不容易。但是有罗素这一成例，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何“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可以坚持至少可以向往的境界。

可惜,一九二〇年罗素应梁启超等邀请,来华讲学,没有取得相应成功。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当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炎黄青年如火如荼,翘首以待,无论是激进、保守,对他都是满怀期望。结果罗素不激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塞维克^①持严肃批评,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始而期望,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罗素在华讲学期未滿,主客双方都觉得尴尬起来,以致罗素后来是带着遗憾,带着不满,离开了中国。

先说两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当局因为罗素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被监禁过半年,对他始终心怀猜忌。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日,罗素在上海上岸,中国学界的接待人员尚未赶来码头,英国驻华使馆与伦敦的外交部、国防部即已函电交驰,意欲趁其码头彷徨,立足未稳,干脆撵回英国。此后罗素在沪、宁、杭、京讲学十个月,始终处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控”监视之下。

北洋政府方面,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因其在华宣传“危险思想”,也曾考虑过要将罗素驱逐出境。所谓罗素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党组织印为传单 of 《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从理论上阐释共产主义合乎人类理性,并没有直接号召中国人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北洋政府几次犹豫,最终没有下手。

被当局如此猜忌者,而且还提供过危险的“小册子”,按中国人的逻辑,是应该受到在野一方激进党人的欢迎了。比如说当时的“南陈北李”?

但是,按照一些材料所叙述的罗素在华日程表,李大钊与罗素似乎没有接触。从陈独秀的态度推测,李对罗素可能是敬而远之。陈独秀参加过北京七团体欢迎会,以后听罗素讲演,越听越觉得不对劲,熬不住,给罗素写过一封信,请教疑难:“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据称,罗素曾给陈独秀写过复信,可惜中途遗失了。不过,按罗素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陈独秀没有下文,这封信即使有,也不太可能使陈独秀满意。

这时,《新青年》编辑部分裂,“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爆发。罗素来自英国,具有鲜明的逻辑实证主义经验论色彩;胡适的导师杜威亦推崇罗素是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比他自己还高明;罗素显然不会简单赞同“主义”派,而且确也引起了“主义”派的不满;这些情况都该说明罗素理应得到“问题”派的青睐。结果也奇

^① 现汉译通译名:布尔什维克。后同。

怪，胡适对罗素访华十分冷淡，并不热情。当时赵元任准备应聘为罗素作翻译，胡适即警告赵不要上梁启超“进步党”的当，力阻他为罗素效力。以后，始终也不见罗素与胡适交往的记载。

那么，对罗素热情最高的是谁呢？可能是当时难以归入某一派别的张东荪。然而，张东荪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当年张东荪三十出头，身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主任。他是通过阅读罗素的《自由之路》等著作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罗素来华之初，张东荪表示对他“崇拜到了十二分”，他还建议罗素“实地去研究中国的同业公会，因为欧洲中世纪之基尔特已经无存了，不能不在中国寻其遗迹，从此遗迹上或有些贡献也未可知。”

意外的是，罗素在中国时间越久，与他的思想距离便拉得越大。最后竟至于建议中国仿效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

毛泽东的态度也有点意思。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润之先生当时在场。有些史籍还说罗素讲演时，他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不可谓不热情，题目也非常配他的胃口。但是听完讲演，毛泽东给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写信，冷冷说道：“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致蔡和森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五页）。大概是因为罗素在这次讲演中，虽然为布尔塞维克的经济模式辩护，却尖锐批评了布尔塞维克政治体制。

北大师生自发组成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在华的主要时间后来就是在这里传业释道，每周参加一次他们的英文讨论会，每两周参加一次他们的中文讨论会。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现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参加以后的讨论会。这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问题望而生畏，而是因为我技术哲学几乎毫无根底，也几乎毫无兴趣。”（Coken Chen 致赵元任，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罗素致柯莉）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八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对于那个名盛一时的“罗素哲学研究会”，罗素后来也不无揶揄，说他们“除一位逊位皇帝的侄子外，全都是布尔塞维克分子”。他个人对布尔塞维克分子抱有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有的同情，当时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过中国学生进入苏俄（见 Chen Ting - Fan 致罗素，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此信对罗素的帮助表示感谢，原件藏罗素档案馆）。从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理想》曾被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做传单印发，甚至可以推测他已知悉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的创建活动（见《先锋日报》[Dairy Herald]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但罗素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信念使得他最多同情这些新的政治势力，不可能直接主张中国人组成像苏俄那种党纪严厉的政党并诉诸武力。至于北京学者群中的社会主义，罗素观感更为不佳。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柯莉信中，罗素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两手抱胸，高谈阔论社会主义，而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则都忙于掠夺中国的富源”。

使人气馁的是，罗素甚至还透露出当时在华的杜威表面上不说，骨子里也有同样的失望：“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地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呆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罗素致柯莉，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这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得从罗素在华讲演的总体内容去寻找。罗素在华发表的哲学主张以五大讲演著称：《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此外，为满足中国人当时对社会政治思想的渴望，他有过两场关于布尔塞维克主义的讲演：《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布尔塞维克底思想》。告别中国时，发表具有临别赠言性质的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综合这些言论，他的总体特点是：

第一，在哲学方面，罗素一贯主张将神秘臆想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自然科学素养者，才能登堂入室。他是由数学入哲学，而不是由文学入哲学，他所认可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最新经验的基础上，与玄思冥想无缘。他拒绝黑格尔式的欧陆哲学，开辟了数理逻辑实证主义。对于听众而言，连杜威也承认：“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和哲学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罗素来华前曾经专程访问苏俄，对苏俄模式有褒有贬。让中国听众困惑的是，他不认为苏俄的弊端是出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叛，相反，他认为苏俄的弊端——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是西方财产寡头体制的翻版。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这样的观点反映了一次大战后西方优秀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普遍向往，同时亦保留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可贵底色。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大幅

摇摆，要么是西化，要么是拒斥西化的俄化，有很大一段距离。

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他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席上说，中国要有“一打好人”（Goodmen），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临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对中国人提出十几条建议，最后一条是把那“一打好人”扩大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Resolutemen）”。然而，这样的“一打好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肯定不是布尔塞维克式的革命家，而是像罗素在英国参加的费边社式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理念，又能脚踏实地，坚韧渐进。

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

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所谓儒林不胜文苑，自古皆然。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即使在今天，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

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利弊丛生；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必足以救国的高度；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

其三，论实践履行，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竿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社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需几代人的磨砺，实在是太为难他们了。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

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直到现在,中国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一轰而起,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丢盔弃甲,见坏就收。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实在太不容易了。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罗素给英国情人的一封信中说:“患病之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这里很干燥,而且人也冷酷无情。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罗素致奥托林)不难想像,罗素在华十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知音难遇,甚至连像样的对手亦难寻觅。其实他是半年不到,即萌去意,后来因病拖延五个月,亦如置身沙漠,只盼早归。拖到七月,能够策杖而行,他终于告别中国学界,与杜威同一日离开了北京。

罗素离开之后,中国知识界面面相觑,亦觉尴尬。随后,对他的影响力之大小,就发生了一场争论。由梁秋水当社长而雇佣外国人 Josef. W. Hall 当主编的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四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罗素的思想并未为中国的青年所欢迎,罗素对中国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丁文江在该文发表的第二天即致信《北京导报》编辑部,要求他们撤回这篇评论。丁文江指出,罗素在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必将在中国造成既深且远的影响;正是罗素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哲学应该是对所有科学进行综合的结果,社会改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识和深思熟虑为前提。“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罗素演讲录的广泛刊载和流传、罗素患病所引起的普遍忧虑、罗素发表告别演说时听众的拥挤程度,都表明罗素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丁文江致《北京导报》编辑部,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平心而论,丁文江过高估计了罗素在华影响。这位在英国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可能是按着他自己对罗素的深入理解,来理解中国听众的理解能力了。

不妨承认,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的,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还是一种双重失望。

七十年前的中国人感到失望,是因为罗素没有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不解渴;七十年后的中国人忙于以激进与保守的二分模式切割“五四”思潮,同样会感到失望,因为无法把他纳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甚至会感到恼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家呢?既激进,又保守,或者说既非激进,亦非保守,说他是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好,还是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好?既有英国人的冷静,又有法国人的热血,或者说是既非英国,又非法国,他是个英国式的法国人呢,还是个

法国式的英国人？既然有激进色彩，为何受中国的激进主义者冷遇？既然有保守主义倾向，为何又得不到中国保守主义者欢迎？太让人别扭了。总之，四不像，非驴非马，无论用什么模式，都套不进去，让你左右为难，过去为难，现在继续为难。让人为难，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才是罗素，这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涵。可以说，一部思想史，就是由一系列为难人物、为难事件组成的。罗素中国之行，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场不成功的思想旅行及其主客两方的错综反映，却对那种有关英法知识分子传统、有关“五四”时期中西思潮交汇的简单化模式，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它促使人们重回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贴着地面运行，怀疑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问题一旦想得复杂，那种不是激进就是保守的僵硬模式就会松动；某些似是而非的虚假学理——比如说以批评“五四”激进主义为名，张冠李戴，暗行绥靖思潮的时髦观点，也就多少露出一一点破绽了。有这样一条积极意义，罗素一九二〇年的中国之行，不也留下了一些可取之处？

是不是罗素太特殊，不能代表英国思想家保守主义的集体性格？也未必。英国哲学家柏克的名字现在是京沪知识界较多引用的一个热点。就我所知的有关柏克那一点史料，我觉得中国知识界对柏克的热衷，似乎也不全面。人们感兴趣的是柏克抨击法国大革命的那篇在英国议会上的讲演，但是忽视了柏克曾经热情支持过美国革命反叛英格兰本邦，而且与十八世纪最激进的流浪革命家托马斯·潘恩一度是莫逆之交，当国人皆曰可杀时，柏克就为潘恩提供过自己的庄园，衣食住行，好生款待。英国知识分子未必都像中国知识界在今天所想像的那样冷血，连柏克都有另外一面。保守主义者多半出身贵族，在政治风浪中，且不论政见离合，对待落难对手，超码具备骑士侠义的一面。中国知识界离开这一点而奢谈保守主义，谈得再好，也只是让这些昔日贵族讥笑为小郡市民的假冒伪劣。当然，真正能够避免法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同时又能凸现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典型，确实不是古典的柏克，而是现代的罗素。

丁文江估计罗素来华的影响，是夸大了些。当时情况下，罗素不可能在逼窄如中国的思想小峡谷中赢得多少真实的掌声。尽管如此，倘若实在要找出一个较能全面体现罗素精神的人——既不放弃知识关怀，又不因此而放弃社会责任，既履践社会责任，又不因此陷入革命狂热，可能还真不是那些一线领袖，而是像丁文江这样的二线人物。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历史中，丁文江是个很值得注意但至今还没有引起注意的人物。在学理层面上，他有形而上眼光，能够超越实用主义的狭隘眼界，领会罗素纯哲学价值。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甚至超过了胡适。但在实践层面，他又是个最具形而下实于精神的人。“五四”之后，他提出中国的责任不在武人、政客，就在几个有责任能力却不敢承担实践责任的知识界领袖，“天下事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能够这样看天下者，就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一点胆识。而知识与胆识的关系，大概是十桶知识也未必换来一滴。他发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以及后来的“好人政府”主张，明显有罗素“一打好人”思想的痕迹。他提倡知